

试析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构建^{*}

王发龙

【内容提要】 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维护既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关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议题。作为一个被西方视作“异质文明”的新兴大国，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尤为紧要，但其战略重心与核心任务显然不是遵循西方式的外交、法律或军事等路径，而应从观念、路径、模式等层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在观念层面，中国应力避纯粹的物质利益观、狭隘的民族主义、褊狭的零和思维，树立正确的综合利益观、共同利益观、合作利益观；在路径层面，中国应力避偏重双边外交的传统机制，从推进经济外交、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军事合作等层面着力，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多元路径；在模式层面，中国应力避以单边主义、黠武主义为主导的零和模式，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国际制度为依托的和合模式。

【关键词】 海外利益维护 正确义利观 多元路径 和合模式 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王发龙，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6)06-0037-18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606003

^{*}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美国亚太政策新变化及中国的对策研究”（12DZZJ02）的阶段成果。

海外利益维护是关涉传统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也是影响新兴大国崛起进程的战略议题。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海外利益进入了全面、均衡、快速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领域的海外利益在发展速度、地理分布、地位比重等方面均有了显著进步，已然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与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中国海外利益在全球层面、不同地区、他国之境面临着不断增多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敏感性和脆弱性也与日俱增。2010 年 4 月 27 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布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显示，遍布全球的海外中资企业之中，未受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仅占 13%。^① 现实表明，中国海外利益实际上深处多重困境，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问题已成为关涉中国社会发展、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议题。2005 年至今，《政府工作报告》连续 12 年提出，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② 十八大报告亦指出，“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③ 2014 年 11 月 28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④。

历史表明，英国、法国、美国等传统大国不仅均将海外利益维护问题提至战略高度，还就海外利益维护的具体举措做出了较完备的战略部署。^⑤ 现实看来，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尽管应该运用外交、法律、军事等手段，但更需要构建具有前瞻性、综合性、导向性的海外利益维护战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瑞·布朗（Kerry Brown）直言道，“目前中国需要战略应对海外利益受损。”^⑥ 因此，本文试图从观念、路径、模式等层面对

^①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2010 年 4 月 27 日，第 26 页。

^② 参见《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54 年至 2016 年）》，中国国务院网站，2016 年 2 月 16 日，http://www.gov.cn/guoqing/2006-02/16/content_2616810.htm。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8 日，第 2 版。

^④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30 日，第 1 版。

^⑤ See Andrei Denisov, “How the MFA Promotes Russian Business Interests Abroa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0, No.4, 2004;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ouncil, *Transformational Government Annual Report 2007*;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May 2010.

^⑥ 参见《专访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瑞·布朗：中国需战略应对海外利

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构建作初步探讨。

一、树立海外利益维护的正确观念

观念乃行动的先导，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当以正确的海外利益观为理念支撑。^①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海外利益观不仅左右着国家对具体利益形态的认知和偏好，还影响着海外利益维护手段的选择和运用。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做好外交工作应该树立、践行正确义利观。毋庸赘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以保障境外公民和法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为基本目标，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②与之相应的是，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亦应树立正确义利观，即综合利益观、共同利益观、合作利益观。^③

（一）树立综合利益观，力避纯粹的物质利益观

异于国内利益的是，“海外利益是国家于主权管辖范围之外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需求的一切权益和好处。”^④在形态方面，海外利益大体可分为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不仅包括对外贸易、海外能源、国际劳务等实体性的物质利益，还包括国际制度话语权、国际文化影响力、国际身份认同度等过程性、观念性的非物质利益。现实表明，中国对海外利益的主观认知和客观实践主要限于物质性海外利益。相较而言，西方大国不但认识到海外利益有

益》，载《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8月11日，第4版。

^① 2004年6月，张运成、冯昭奎等学者提出了“海外利益观”一词，探讨了中国“新海外利益观”与“和平崛起”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参见杨磊、张运成：《中国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载《中国经营报》2004年6月21日。遗憾的是，学界至今对中国应树立何种“海外利益观”及如何构建等问题的研究甚是乏力。

^②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第2版。

^③ 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保障国家安全无疑乃任何国家获取自身利益的核心诉求和开展对外活动的主要目标。全球化时代，绝大多数国家将保障海外公民和法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作为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重心。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第四次亚信峰会上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2015年11月22日，李克强在第十届东亚峰会上亦表示，“中方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基于此，本文提出“综合、共同、合作”的海外利益观，无疑有其充分的现实根据和政策基础。

^④ 王发龙：《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基于国际制度的视角》，载《国际展望》2014年第3期，第53页。

其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而且高度重视非物质性海外利益的拓展和维护。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看来，“道德价值观只是无形的国家利益。……维持国际秩序乃美国的国家利益。”^① 英国一贯认为，“英国国家利益与维护以英国为主要创始国的国际体系密切相关。”^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大国大多将海外投资运营、能源资源获取、国际机制建设、国际秩序维护、价值观念传播视为海外利益的核心要素。^③ 1970年6月18日，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在大选中表示，“我们将保护英国的海外利益”，……“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将符合英国人的长远利益。”^④ 奥巴马政府2011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利益与更加广泛的国际稳定体系紧密相连，该体系包括联盟、伙伴关系和多边机制。”^⑤ 对任何国家而言，物质利益是海外利益的本原和主体而皆为各国政府所高度重视。相较而言，非物质利益则更具韧性、更为长久，是影响物质利益不断发展的智力支撑和理念保障。对大国而言，海外非物质利益的重要性有时并不亚于海外物质利益。比如，中国高度重视海外文化利益的发展和维护，大力推进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建设以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认为，“一个伟大的自豪的和高尚精神的人民将宁可面对战争带来的所有灾难，也不以国家荣誉为代价换取那种基本的繁荣。”^⑥ 必须指出的是，学界对海外利益的研究大多囿于对外贸易、海外投资、地缘安全等物质范畴，不仅对国际形象、国际认同、国际话语权等非物质性海外利益的研究乏善可陈，

^① Joseph S. Nye, Jr.,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9, pp. 22-23.

^② Ashley Jackson, “Empire and Beyond: The Pursuit of Overseas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2, No. 499, December 2007, pp. 1353-1354.

^③ See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December 1999;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July 2000; Karl W. Eikenberry, “The Effective Use of American Power: Defining and Defending America’s Interests Abroa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34, No. 5, 2012.

^④ Iain Dale, ed., *Conservative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 1900-1997*,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181-196.

^⑤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011.

^⑥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甚至将海外利益等同于物质性海外利益。在外交实践中,中国通常将公民和法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视为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重心,这导致对非物质性海外利益的维护重视不足。应当指出,物质性海外利益与非物质性海外利益均是国家在境外的重要利益诉求,尽管形态各异且地位不一,但两者均不可偏废。

为此,中国应在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的实践中树立综合利益观,力避两种错误的认知倾向。其一,不可将眼界囿于纯粹的物质主义范畴而只强调物质性海外利益,认为非物质性海外利益在海外利益之整体利益格局中的地位和分量微乎其微,乃至仅作为物质性海外利益的附属品、衍生物而存在。其二,不可受唯心主义的羁绊而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国家形象、国际影响力等非物质性海外利益,以至妨碍了对物质性海外利益的发展和维护。

(二) 树立共同利益观, 力避狭隘的民族主义

海外利益是个主体多元、内容庞杂、层次繁多的综合性利益体系。在主体方面,海外利益大概可分为公民、法人、国家(以政府为代表)及国际共同的海外利益等。随着世界发展大势和自身国情国力的变动,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或处于不同时代的同一国家通常会对海外利益有着不同的认知、界定和偏好,进而采取使自身海外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明显的是,全球化无疑是驱动各国海外利益生成、发展、存在的核心外生变量。马克思早已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① 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尽管仍保有其鲜明的私利性、排他性、不可分割性,但已明显异于殖民利益而更具合约性、合法性,异于国内利益而更具共存性、包容性。应当指出,海外利益因生成和发展于他国之境或全球公域,其有效维护和不断实现通常有赖于利益所属国和利益所在国的协力合作。进而言之,全球化时代的海外利益将更难具有充分的排他性和私利性,远非海外利益所属国的一己之私,而是推动、维系国际关系进步和国际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冷战结束以来,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气候恶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全球治理困境的不断显现,尽管使得国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

之间具有了更多的国际共同利益，但部分国家仍无视他国的合理利益关切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此形势下，中国在发展、维护和实现海外利益的实践进程中，应注重海外利益相关方的合理关切、增进对国际共同利益的认知与保护。比如，中国基于合作共赢的理念和维护地区安全的考虑而打击中亚“三股势力”、推进区域安全合作，不仅有助于保障自身在中亚地区的投资、能源开采、文化交流、地缘政治等方面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还有利于培育自身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国际共同利益。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做好外交工作“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①

不难预见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交往密度的迅速提升和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增强，各国的海外利益在全球范围将难享“势力范围”、难现泾渭分明之态，会在国境之内、地区之间乃至全球公域以交集形式、融合形态渐呈卯榫相合、荣损与共之势。全球发展大势已然明朗，不同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已越来越多，海外利益的共存性、包容性亦更趋明显，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和历史必然。在此形势下，中国在发展、维护和实现海外利益的过程中，应力避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树立共同利益观以增进自我与他者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三）树立合作利益观，力避褊狭的零和思维

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作为存在于境外的利益形态，海外利益的产生、发展、维护和实现均非利益所属国可独力而为，有赖于利益所属国、利益所在国乃至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2014年7月4日，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了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他表示，中国“倡导合作发展理念，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② 历史显示，传统大国之海外利益发展的战略重点是保障一己之私而非增进共同利益，海外利益维护的主导方式是倚重

^①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5日，第1版。

单边行径而非借力国际合作。现实表明，单边主义、自助行为仍是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主要选择，明显已不合时宜而难以保障海外利益的发展和安。应当指出，国家自身海外利益的安全不但有赖于独力维护，还应基于合作利益观以增进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合作。合作利益观，即强调海外利益的不同主体和利益相关方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摒弃零和思维主导下的单边行径和自助逻辑，以合作方式促进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实现。显而易见的是，全球化时代的海外利益早已超越了人们的传统认知视野，不再完全由国家自身决定而需顾及他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正当利益关切。冷战结束以来，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各国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带来了综合威胁，国际合作而非“独力自助”理应成为所有国家维护海外利益的必由之路。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强调，“各国要同心协力，妥善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越是面临全球性挑战，越要合作应对，……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①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惨遭重创，令世界经济明显衰退，一片萧条，由此加剧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艰巨性和长久性。在此形势下，消除金融危机的影响、保障海外利益的安全绝非任何国家可独力而为，有赖于世界各经济体乃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协力合作。

全球化时代，国家无论大小、不管强弱，都应站在时代发展与人类进步的高度，基于合作共赢理念、运用国际合作方式来应对海外利益所面临的现实威胁与潜在风险，进而保障自身海外利益和国际共同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海外利益逐渐步入迅速发展的高速轨道。随着各领域海外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生成与迅速拓展，中国如何保障海外利益安全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作为一个海外利益后发国，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基本前提无疑是在理念层面树立海外利益维护的正确义利观，在实践中力避零和思维、树立合作利益观，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提升与利益所在国、利益相关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合作力度。

^①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2版。

二、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多元路径

作为综合性的利益体系，海外利益在内容上可划分为海外经济利益、海外政治利益、海外文化利益、海外安全利益等。全球化时代，国家应该对海外利益所面临的多重威胁和风险采取多种举措、构建综合机制。习近平指出，“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① 与之相应，中国亦应在国际社会从推进经济外交、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军事合作等层面着力，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多元路径。

（一）推进经济外交

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基础部分和重要方式，经济外交对海外经济利益维护有着无可代替的作用。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推进经济外交已成为各国进行海外经济利益维护所无法回避的必然选择。客观而论，中国的经济外交起步晚、进度慢、成效低，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后才缓慢发展起来，更遑论对海外经济利益的安全发挥保障作用了。经过30余年的实践探索，中国的经济外交尽管手段更加多元、领域日渐宽广、发展日益迅速，但总体上仍处于难助自身、落后于人的初始阶段。比如，中国尽管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国际经济机制内，中国提出的新规则寥寥无几。……中国通常会接受世贸组织的全部决策程序和结构，并且在组织内发挥领导作用一直较为谨慎。”^② 2004年8月，胡锦涛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上强调，要加强经济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③ 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全面加强经济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积极维护我国公民在海外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④

^①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1版。

^②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 23.

^③ 《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04年8月30日，第1版。

^④ 参见《人民日报》2005年3月15日，第1版。

基于此,中国应加大经济外交力度,为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提供有效保障。一方面,应拓展双边经济外交路径。比如,中国应通过与海外利益相关国开展双边经济对话,解决双边贸易纠纷和投资争端,签订投资、贸易、税收等方面的双边协定,为海外经济利益维护提供基本的机制保障。如中韩自贸协定于2015年6月1日签署,无疑为维护双边贸易的发展与安全提供了有效的机制保障。另一方面,应提升多边经济外交力度。比如,中国应继续通过创建国际经济机制、改革国际经济秩序、推进国际经济治理等方式,为海外经济利益维护提供合法框架。近年来,中国不仅在参与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推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地区性国际经济机制的创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无疑为保障对外贸易、海外投资、国际金融等海外经济利益的发展与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战略平台。

(二) 增进政治互信

与国内利益不同的是,海外利益的发展态势和安全状况不仅取决于利益所属国,还有赖于利益所属国与利益所在国的政治关系。被西方视作“异质文明”,中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与部分传统大国存有较深的战略互疑和政治不信任,这成为阻碍其海外利益发展与安全的结构性障碍。近年来,中国在非洲、中东、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经济利益快速拓展,引起了美国、英国、法国等传统大国乃至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心理恐惧、认知错误和战略疑虑。其中,美国政界和学界部分人士表示,中国的对外投资和能源资源开采掀起了新一轮“殖民主义”运动,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是对世界秩序和美国霸权的严重“威胁与挑战”。2011年6月1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赞比亚宣称,中国正在非洲大陆实施“新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投资与援助并不总是顾及非洲人民的利益。^①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更是直言道,“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与西方领军的民主国家的停滞和瘫痪相重合,

^① 《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新华网，2011年6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6/14/c_121535286.htm。

这带来了西方人心理上的不安”^①。

在此形势下，中国应加强与海外利益相关国的政治交往和战略对话，为海外利益维护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一方面，应继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快速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应继续秉持“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理念，大力发展新型国际关系而构建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通过在国际互动进程中消减他国的战略疑虑来增进政治互信和国际认同。例如，2015年4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同意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无疑为中巴经济走廊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夯实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应大力拓展政治交往渠道。在主体方面，中国应在强化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充分发挥公民个人、跨国企业、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的辅助作用，形成“以民促官、官民结合”的外交新合力。在路径方面，中国应在加强政府外交的同时，统筹政党外交、议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外交方式，开创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外交新局面。

（三）促进文化交流

文化是国际社会的一股柔性力量，同质文化乃促进海外利益生成和发展的外在驱动，异质文化则是阻碍海外利益维护与实现的结构障碍。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看来，“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②历史与现实表明，源于不同文化的国家更难以形成对彼此利益的认可和共同利益的认知。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碰撞、侵袭、异化等现象，不断凸显出来而渐呈“全球化”之势。在此形势下，中国与他国（尤其是西方大国）在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外交理念等方面的差异，显然不利于自身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比如，美国安可顾问公司全球总裁马格里·克劳斯（Margery Kraus）就曾表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会面临劳工等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文化差异是最大的挑战。”^③阿联酋海湾研究中心主席阿布杜拉齐兹·塞

^① 王波：《中国人要买下世界吗？》，载《中国青年报》2011年4月6日，第9版。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③《安可顾问公司全球总裁：文化差异是企业海外并购投资面临的最大挑战》，第一财经网，2013年4月8日，<http://www.yicai.com/news/2611065.html>。

奇 (Abdelaziz Sage) 也认为, 中国和中东的经贸往来受阻于两种文化间缺少理解, 文化差异像横在双边贸易间的障碍物。^①

这样, 中国应提升国际文化交流的力度和进度, 增进与他国的文化认同, 为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提供精神支撑和理念保障。一方面, 应拓宽传播自身文化的路径。例如, 中国可通过合办高等学校、设立科研机构、开办孔子学院、签订文化协定、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 建立中外文化交流的长效机制。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孔子学院已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主体。截至 2015 年年底, 全球 135 个国家共建立了 500 所孔子学院和 1 000 个孔子课堂 (遍布亚、非、欧、美、大洋等世界各洲), ^② 基本上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网络。另一方面, 应加大了解他国文化的力度。比如, 中国的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等海外利益主体在“走出去”之时, 应强化对海外利益所在国 (所在地) 的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要件的了解和学习, 进而在与当地社会的互动进程中消弭文化差异、增进文化认同。2014 年 5 月, 李克强在访问非洲时曾指出, “真正扎住根, 还是要了解当地文化、尊重当地习俗。和谐相处, 才能把项目做得更大, 成就也一定会更大。”^③

(四) 加强军事合作

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 军事力量是任何国家保障海外利益安全的坚强后盾和最终手段。诚如弗里德曼所言, “离开看不见的拳头,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永远不起作用。……保障硅谷科技在世界发挥作用的看不见的拳头, 叫做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④ 后冷战时代, 国际交往的速度、密度、频度均不断提升, 这使得海外公民和法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更易于遭到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威胁。在此形势下, 国家不可亦不能凭一己之力应对海外利益的威胁因素, 需要借助国际军事合力打击海盗、劫匪、恐怖分子等不法势力来保障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中国坚持

^① 《新加坡媒体: 文化差异阻碍中国和中东贸易》, 环球网, 2008 年 4 月 10 日, <http://oversea.huanqiu.com/entertainment-Articles/2008-04/990.html>。

^②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 2015 年, 第 12 页。

^③ 《李克强: 在非中企了解当地文化才能扎住根》, 新华网, 2014 年 5 月 5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05/c_126464123.htm。

^④ Thomas L. Friedman, “A Manifesto for the Fast World,”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28, 1999, p. 3.

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并不意味着放弃运用武力保障海外利益的路径选择,而是通过不断加强国际军事合作来消减海外利益的威胁因素。2013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提出,“开展海上护航、撤离海外公民、应急救援等海外行动,成为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利益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方式。”^①2015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军事战略》进一步提出,“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维护海外利益安全”^②。

因此,中国应继续提升国际军事合作力度,为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提供安全保障。一方面,应强化与他国的双边军事合作。比如,中国可与海外利益相关国在联合执法、反恐行动、打击海盗等方面加强军事合作,以国际合力应对海外利益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2011年以来,中国与老挝、缅甸、泰国通过召开部长会议、签署联合声明、成立指挥机构、开展联合执法(三十余次)等方式,有效打击了湄公河流域的河盗、劫匪、恐怖分子等不法势力,维护了中国商人、船员、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应增进多边框架下的军事合作。比如,中国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亚信会议等国际安全机制的框架下,通过参与维和行动、开展联合巡逻、举办反恐军演、促进安全对话等方式,以国际军事合力应对恐怖主义、海盗劫匪、武器扩散等威胁因素,为海外利益的发展和提供机制化、常态化的军事保障。

三、构建海外利益维护的和合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海外利益发展逐渐展现出全面、均衡、快速的繁荣之势。但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尚显滞后,不仅仍未摆脱弱国心态和“落后就要挨打”的主观认识,也尚未探索出符合自身国情国力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实践模式。作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海外利益大国,中国的海外利

^① 《国防白皮书: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新华网,2013年4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16/c_1115403491.htm。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新华网,2015年5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6/c_1115408217.htm。

益维护应力避以单边主义、黠武主义为核心的零和模式，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国际制度为依托的和合模式。^①

（一）力避以单边主义和黠武主义为主导的零和模式

海外利益有着不同的生成机制和发展方式，亦有其不同的维护模式和实现路径。其中，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传统大国在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的历史进程中，构建了以单边主义、黠武主义为主导的零和模式。

一方面，黠武主义乃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主要选择。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大国在全球开拓殖民地的同时，通过在海上的战略要道附近布设军事据点，以坚船利炮维护原料获取、远洋运输、奴隶贸易等方面的海外利益（殖民利益）。近代以降，无论是英国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圈地运动”，美国在拉丁美洲实施的“大棒政策”，还是日本在东亚地区谋划的“大东亚共荣圈”，武力乃其海外利益维护的主导方式。1898年12月，美国于美西战争结束后旋即在菲律宾和古巴着手建立海军基地，以保障在相关地区的海外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冷战之后，武力仍是西方传统大国保障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比如，英国颁布的《2007年度政府改革报告》明确表示，英国“把国防部的工作和军事开支视为维护其全球利益的重要支柱”。^②再如，美国强化了以武力保障海外利益的力度，通过部署海外军事基地、强化军事同盟、加强海外武力投放等方式来维护海外利益。诚如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所言，“我们在全球运用武装力量以维护我们的利益，……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在必要之

^① “和合”一词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和合学”的创立者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认为，“和合”有着“新生事物或新质事物产生的原因”事物“存有的方式”“形上学本体”“心灵境界”等四层涵义。参见张立文：《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源流的考察》，载《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1-2期，第56-57页。在国际政治学界，学者早已将“和合”的概念和思想用于学术研究。相关成果参见张立文：《和合外交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议》，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11期，第14-21页；刘江永：《海陆和合论：“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的地缘政治学》，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5期，第3-21页；倪世雄：《习近平“和合”外交思想》载《人民论坛》2015年第19期，第36-39页。

^②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ouncil, *Transformational Government Annual Report 2007*; 转引自汪段泳：《海外利益实现与保护的国家差异：一项文献综述》，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2期，第35页。

时，决定在何地、从何时、依何种情况部署武装力量。”^① 2012年9月，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2013财年美军基地结构报告》（*Base Structure Report Fiscal Year 2013 Baseline*）显示，美国已构筑了覆盖全球的军事网络，其部署在40个国家的598个海外军事基地^②，成为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支点，为其商品市场、能源运输、海外救援、航道安全等海外利益提供安全保障。

另一方面，单边主义乃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惯用手段。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传统大国在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时往往选择单边主义。其中，英国和美国有着较为久远的单边主义传统。1796年9月17日，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宣称，“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策路线。”^③ 历史与现实表明，美国“不同的政策路线”即在国际交往中以单边行径保障自身利益，这奠定了单边主义外交（孤立主义）的理念基础。^④ 此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多以单边主义为指导，通常无视他国的正当利益关切而“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事务、获取海外利益。无论是实施“门罗主义”将拉丁美洲划为势力范围，还是推行“大棒政策”侵占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美国均以单边行动维护其海外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利益和国际战略利益。冷战时期，单边主义仍是美国进行海外利益维护的主要外交理念和路径选择。20世纪50年代，美国假联合国之名扩大朝鲜战争，以维护自身在远东的地区秩序主导权、地缘政治利益等海外战略利益。60年代，美国以遏制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为由而独自发动了越南战争，以保障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后冷战时代，美国海外利益维护实践中的单边主义行径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小布什政府甚至将单边主义发挥到极致，惯于通过传播价值

^① Madeleine Albright, “Advancing American Interests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6, No. 8, 1995, pp. 127-130.

^② Department of Defense, *Base Structure Report Fiscal Year 2013 Baseline (A Summ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 Real Property Inventory)*,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012.

^③ George Washington,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1796,”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 Yale University, http://avalon.law.yale.edu/18th_century/washing.asp.

^④ 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在实质上具有相通性、一致性，二者皆以“我们是为我们自己行动，不是为别人而行动的”为基本理念。为此，我们可将孤立主义视为单边主义的原初形态和基础，单边主义是孤立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观念、颠覆政权乃至发动战争等方式，来保障能源开采、民主化改造、地缘政治等方面的海外利益。比如，小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大肆推行“价值观外交”，宣称“积极致力于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同时，^①无视联合国、国际社会乃至部分盟国的反对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冷战思维并未随着冷战的终结而终结，单边主义亦没有随着多边外交的时兴而退出历史舞台。全球化时代，各国在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的实践进程中，应超越单边主义和黠武主义主导下的零和模式。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缺乏丰富的海外利益维护经验，尽管应该借鉴传统大国维护海外利益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模式，但是零和模式、零和思维早已不合时宜。^②

（二）构建以共同利益和国际制度为核心的和合模式

“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加强国际合作、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的战略主张。习近平指出，“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③ 秦亚青也认为，“‘和合’是真正具有中国内涵的概念，是根本不同于西方世界观的思想理念。挖掘发展这一概念、使之成为核心理论概念，既有中国灵魂、又有普世价值，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一个关键所在。”^④ 笔者认为，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和合模式明显异于西方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零和模式，它既蕴含着合作共赢、和谐共生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理念，又彰显着“和而不同”“独善其身”的中国气派与“协和万邦”“兼济天下”的世

^①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002.

^② 应当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根本政治制度、传统历史文化都规定并昭示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代表的不单是一个国家的崛起，还是一种文明的复兴。显而易见，近年来引发全球热议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现象表明，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武力崛起之途的和平发展道路。为此，对崛起于异质文明的中国而言，在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的实践进程中，理应借鉴（更应鉴别）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模式，以免陷入“食而不化”的尴尬境地而贻误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

^③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1版。

^④ 秦亚青：《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11页。

界情怀。^①

一方面，增进共同利益认知，夯实国际合作基础。恩格斯曾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海外利益的生成机制、发展方式、存在形态均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仅相互交织、彼此交融，还逐渐形成利益汇合点乃至利益共同体。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Mill）认为，“除非照顾到所有国家的利益，否则任何国家都无法依靠任何手段获得利益；即使能够获得，也不应该去寻求。”^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并固化了“两头在外”的总体经济发展格局，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不断上升而致其经济敏感性和脆弱性日渐凸显。在此形势下，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不应限于自身发展的个体维度而需基于国际社会的整体维度，增进对他国正当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的认知和维护，惟其如此方可获取双赢、共赢之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④毋庸赘言，无论个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共同利益无疑乃达成、促进、维系合作关系的天然纽带，但是未被制度化的共同利益是脆弱的、短暂的。美国学者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也认为，“仅有共同利益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这些共同利益是否转化成为共同的，或至少是相辅相成的政策。”^⑤

另一方面，挖掘国际制度潜能，搭建国际合作平台。任凭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任何层面的国际合作均非国际互动的常态而常因利益分配、预期收益、

^① 海外利益维护的和合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合作模式，它以正确义利观为理念基础，讲求合作共赢、义利兼顾。历史与现实表明，西方大国为攫取瓜分势力范围、掠夺资源能源、抢占战略要地等海外利益，通常采用国际合作方式。比如，八国联军在侵华期间为了在划分势力范围、掠夺金银财宝、争夺战争赔款等方面使其海外利益（殖民利益）最大化，采取了“求利弃义”的国际合作方式。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③ [美]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④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2版。

^⑤ 倪世雄、王义桅：《中美国家利益比较》，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权力对比等问题而搁浅或终止。随着国际交往密度和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提升,尽管国家之间存在着足以促成国际合作的、不断增加的共同利益,但国际纷争与冲突仍时有发生。换言之,国家之间仅有共同利益并不足以达成和维系国际合作。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指出,“仅存在共同利益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制度的存在才行”^①,因为“国际制度具有促进合作的潜能,若没有国际合作,人类必将难以繁荣。”^②明显的是,国际社会的制度化进程和规范性程度与日俱增,制度本位无疑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的大势所趋。此外,海外利益有其充分的合约性、合法性,大都受海外利益所在国法律、国际法、国际制度等合法框架的承认与保护。在此形势下,各国借助国际制度以维护海外利益则更具可能性与可行性。例如,自2008年12月开始,中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与相关国际法积极参与打击海盗行动,有效地保障了中国、他国以及国际组织航经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人员和船舶的安全。作为国际社会的规范性结构,国际制度能够通过克服“政治市场失灵”而促进国际合作,它对“合作出现和进步的贡献,……是通过改变国家以自我利益为基础进行的决策环境来达到的。”^③又如,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加强了政策协调、情报共享、军事演习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消减了“三股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威胁,保障了自身海外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的发展与安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在2013年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强调,“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④基于此,中国应继续通过参与、改革、创建、运用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方式,来搭建国际合作的战略平台、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制度路径。

应当指出,共同利益的不断增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制度化、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②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1988.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11页。

^④ 杜尚泽、林雪丹:《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14日,第1版。

规范化乃国际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对各国而言，增进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加强国际制度框架下的国际合作无疑是海外利益维护的应然选择。对中国而言，借力联合国安理会、G20、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平台来拓展国际制度路径、提升国际合作力度，实乃海外利益维护的理性选择。

结 束 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海外利益展现出不断生成、快速发展和有效实现的良好态势，已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与此相应，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外利益维护问题而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孔子曰，“可久者圣人之德，可大者圣人之业。”毋庸赘言，海外利益维护即是中国一项神圣而伟大的长久事业。纵观历史，历代崛起大国之所以最终实现崛起，是因为在海外利益维护的长久征程中做出了历史性创新，在器物、制度、理念等层面引领时代潮流。审视现实，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与和平崛起进程相伴而行，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构建不仅影响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具体利益，还关涉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等战略性利益。展望未来，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在全球层面将遭遇权力掣肘、制度约束、文化侵袭，在国家层面将面临守成大国的心理疑虑、错误认知、战略打压。作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兴大国，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尽管需要借鉴传统大国的历史经验，但更需要的是构建符合自身国情国力、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战略框架。

[收稿日期：2016-07-23]

[修回日期：2016-08-19]

[责任编辑：陈鸿斌]